

公安派文学的分期

周家洪

(长江大学 文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以三袁在不同时期文学理论和创作方面反对复古、拟古的实绩为标准,公安派文学分为兴起期、鼎盛期和衰落期。1587年(万历十五年)袁宗道文学创作由模拟复古派转变为反对复古派为公安派文学兴起的开始,至袁宏道提出公安派文学理论核心主张前的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为公安派文学的兴起期,共九年;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提出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核心主张开始,到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袁宗道去世前为公安派文学的鼎盛期,共五年;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袁宏道因受袁宗道去世和京师攻禅事件的双重打击而发生转折,进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后期开始,到1626年(天启六年)袁中道去世为公安派文学的衰落期,共二十六年。在公安派发展变化过程中,三袁作为领袖在共同发挥作用的同时又各有侧重,三人分别在三个时期先后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关键词:公安派文学;分期;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9)04-0034-06

公安派文学是晚明一个盛极一时、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公安派并没有公开宣布成立公安派,而是在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拟古并最终击败复古派、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个松散文学团体。因其领袖是湖北公安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而被后世称作公安派。公安派文学各阶段缺乏清晰明显的标志,因此,其分期或发展变化的阶段较难确定,在公安派文学的研究中成果相对较少。截至2018年底,只有熊礼汇、钟林斌、李圣华、黄仁生、陈菁华等人的研究成果。熊礼汇以袁宗道活动为依据将公安派的发展分为肇始阶段(万历十七年至万历二十三年)、成熟阶段(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和嬗变阶段(万历二十六年以后),^{[1](P360~375)}钟林斌分为形成与爆发期(万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发展期(万历二十六至三十八年)、衰微期(万历三十九年至天启三年),^{[2](P49~74)}李圣华分为酝酿期(约万历八年至二十二年)、渐进期(约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年)、骤变期(万历三十一年之后十余年),^{[3](P117~128)}黄仁生分为酝酿准备时期(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开宗立派时期(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调

整发展时期(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八年)、矫弊救衰时期(万历三十九年至天启六年),^{[4](P267~278)}陈菁华分为酝酿准备期(万历八年至二十二年)、大盛期(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衰落期(万历三十三年至四十年)。^[5]这些研究成果都没有得到公认,因此,学术界一直没有明确公安派文学的分期。

现有关于公安派文学分期的研究成果共同存在的问题就是时间划分不准确或者分期名称概括不准确;个别的还存在划分标准没有说服力,如熊礼汇抛弃三袁中的袁宗道和袁中道,只以袁宏道的活动为依据就不全面、因而不准确,很难有说服力。笔者参考现有研究成果,以三袁不同时期受到焦竑、李贽、汤显祖、徐渭等人的影响后在文学理论和创作方面反对复古、拟古的实绩为标准进行划分,认为公安派文学从1587年(万历十五年)袁宗道文学创作由模拟复古派转变为反对复古派为公安派文学兴起的开始,至袁宏道提出公安派的核心理论前的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为公安派文学的兴起期,共九年;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提出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核心主张开始,到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袁宏

收稿日期:2019-03-19

作者简介:周家洪(1965—),男,湖北荆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转型和楚国历史与文化研究。

道去世前为公安派文学的鼎盛期,共五年;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袁宏道因受袁宗道去世和京师攻禅事件的双重打击而发生转折,进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后期开始,到1626年(天启六年)袁中道去世为公安派文学的衰落期,共二十六年。在公安派发展变化过程中,三袁作为领袖在共同发挥作用的同时又各有侧重,三人分别在三个时期先后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一、兴起期(1587年—1595年)

从1587年(万历十五年)到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袁宏道提出公安派文学理论核心主张之前为公安派文学的兴起期,共九年。这一时期,袁宗道是主帅,袁宏道是副帅,袁中道作用不大。

(一)袁宗道文学创作由复古、拟古转向反对复古、拟古

公安派并没有明确的发起或成立日,只有从其他方面来确定它的起点。1586年(万历十四年)袁宗道考中进士、第二年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是袁宗道人生乃至三袁人生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袁宗道没考上科举,包括袁宗道在内的三袁兄弟肯定会继续被其父严格地督促准备科举考试,不可能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袁宗道自己仍旧生活在老家公安县,人生道路不会改变,不可能去看外面的世界,不可能结交焦竑、李贽等给三袁以巨大影响的人,也不可能给袁宏道、袁中道开辟道路;袁宗道没成为翰林院编修,那他还得继续等待候任,他就不可能把主要时间和精力转向反对“后七子”的复古、拟古活动,他和袁宏道、袁中道等公安派反对复古的文学事业就无从谈起。因此,袁宗道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是袁宗道人生和文学事业的转折点,也是公安派文学兴起的前提。另外,公安派是以反对前后七子尤其是“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拟古而出名的,因此,袁宗道文学创作由模拟复古派转变为反对复古派,就应该是公安派的起点。袁宗道文学创作由模拟复古派转变为反对复古派是1587年(万历十五年)。因此,1587年(万历十五年)为公安派兴起期的起点。

1587年之前,从三袁在家乡接受龚惟长的文学训练、为三袁打开文学大门开始,到1586年(万历十四年)袁宗道考中进士,可以说是公安派的准备期(或孕育期或酝酿期)。之所以不把公安派的准备期(或孕育期或酝酿期)作为一个时期,是因为事物或组织是从它产生开始算起,正如人的年龄是从他

(她)出生时算起而不是从怀孕开始算起一样。

袁宗道为诗最初学李攀龙、王世贞,不仅熟读,而且认真摹仿。但是他逐渐觉得李、王之诗过于刻板,便怀疑诗文之道不全是这样,就试图另辟蹊径,以摆脱束缚。在翰林院,袁宗道结识了李贽的弟子深有和尚,受其“心性”之说的影响。1587年袁宗道向焦竑问学,又深受焦竑的顿悟见性之说影响。后来,袁宗道奉使到湖北,逗留家乡,把从深有、焦竑那里学来的知识传授给袁宏道、袁中道,并引荐袁宏道、袁中道认识深有、焦竑。通过焦竑的介绍,1590年和1593年袁宗道率领袁宏道、袁中道等人拜访李贽,求教文章之道。李贽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使袁氏兄弟大受启发。在受到深有、焦竑尤其是李贽的影响后,袁宗道最先写文章对复古派的弊端提出批评。他针对李、王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提出责问:“汉、唐、宋诸名家,如董、贾、韩、柳、欧、苏、曾、王诸公,及国朝阳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彼何所见乃强赖古人失理耶”的问难,并且反驳道:“沧溟强赖古人无理,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何说乎?”进而一针见血地点明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6](P284)}。为此,袁宗道还特别选白居易、苏轼作为自己诗文的学习榜样,并将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所写诗文以白、苏平易畅达之风为旨。当时陶望龄、黄辉、董其昌、苏惟霖、吴用先、顾天埃、李腾芳、王图、黄节等人纷纷赞成袁宗道,聚集在袁宗道周围,经常举行小型聚会,商讨新诗创作,反对“后七子”,公安派文学自然兴起。这一时期,公安派尤其是袁宗道的诗歌创作从富丽豪华转为清新流畅,写景抒情行文自然,文字清新活泼,文笔秀逸,意趣盎然。在袁宗道等人的反对下,“后七子”首领之一的王世贞晚年文风都有所转变,复古派追随者有的改弦更张。因此,袁宗道是公安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兴起期的主帅。

(二)袁宏道文学和思想创作由复古、拟古转向反对复古、拟古

袁宏道在兴起期主要是在袁宗道带领下快速成长。袁宏道文学禀赋在三袁中最高,但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兴起期袁宏道和哥哥、弟弟两次拜访李贽,尤其是1591年,他又单独去麻城龙湖拜会李贽,深受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袁宏道视野大开,明白以前的创作都是鹦鹉学舌,并不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

一从胸襟流出”^{[7](P754)}，卓然独立。1592年(万历二十年)袁宏道考中进士，更是如虎添翼，以自己的诗文创作实践支持袁宗道。

复古派在袁宗道领衔、袁宏道协助、袁中道和其他人员参与的公安派进攻下影响逐渐减弱，公安派文学的影响逐渐增强。1592年(万历二十年)，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等复古派核心人物相继去世后，公安派的影响超越“后七子”，逐渐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直到1596年大兴。因此，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是公安派兴起期的终点。

二、鼎盛期(1596年—1600年)

从袁宏道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提出公安派文学理论核心主张开始到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袁宗道去世，袁宏道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创作方面都取得巨大实绩，袁宗道、袁中道及其他公安派成员呼应、支持、协助袁宏道，公安派快速发展到鼎盛，共五年。在鼎盛期袁宏道是主帅，袁宗道是副帅，袁中道是干将，公安派其他成员如江盈科、陶望龄、潘之恒等对公安派的大盛也起了一些作用。

(一)袁宏道的巨大作用

袁宏道深受焦竑、李贽影响，尤其是1591年单独拜访李贽之后，思想发生飞跃，又于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结识汤显祖，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发现徐渭诗集而大受影响，并融会贯通焦竑、李贽、汤显祖、徐渭等人的思想，然后在吴地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核心主张，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开始创作大量体现其主张的作品，与复古派在吴中的代表人物张献翼激烈论战，最终彻底击败复古派，1598年去北京任职继续反对北京的复古派，和袁宗道一起在北京崇国寺结社。袁宏道的这些活动标志公安派进入鼎盛期，同时也表明他后来居上，超越其兄袁宗道成为公安派主帅。

第一，袁宏道提出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核心主张。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核心主张。“独抒性灵”是就创作内容而言的，强调作家创作要抒发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个性，这样的作品才会各具特色；“不拘格套”是就创作形式而言的，就是要根据内容来确定相应的形式，不拘泥于古代格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后七子”活动中心地区——吴中地区的提出，给复古派以有力批判，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得到很多士人的认可和拥护，逼迫“后七子”成员也因此改变复古、拟古文风，个别成

员甚至转投公安派，是公安派大兴的起点。

第二，袁宏道创作了大量体现其主张的作品。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底袁宏道清理自己的文稿，先刻印旧作《敝篋集》，又将任吴县县令以来的诗文编为《锦帆集》刊印，继续阐发性灵说的内涵且有所补充，与《叙小修诗》《白苏斋册子引》一起称为公安派“性灵说”的三篇代表作。1596年冬丘长孺将《北游稿》分寄袁氏兄弟，袁宏道作《丘长孺》，更加强烈地批判因袭模拟文风。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正月，袁宏道先辞去后获准离任吴县县令后，为了消除心中的不快，袁宏道并没有立即离开吴地，而是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达一年有余。和袁宏道相交或从游者还有潘之恒、丘坦、袁蕴璞、无念、潘稚恭、梅蕃祚、顾大猷、袁文炜、黄炜、王野等。袁宏道几乎每至一地，都赋诗作文，广交朋友，并以寄诗书的方式和任苏州县令的江盈科保持密切联系。这年五月，袁宏道途经苏州时与江盈科见面。江盈科索取袁宏道新作《解脱集》诗二卷付印，并为之作《解脱集序》。这年六月，袁宏道侨寓仪真后又寄给江盈科游记、尺牍二卷，江盈科再作《解脱集序二》，与前二卷一起刊行。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开始，袁宏道漫游于仪征、南京、扬州之间，在这三地所作诗歌结集为《广陵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袁宏道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不觉惊跃”“如魔得醒”，为徐渭“恣臆谈谑，了无忌惮”的诗风所倾倒，从而愈加强对“后七子”的复古文风不满，更加强烈地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清新，隽秀活泼；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晚游六桥待月记》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序言、部分书信在内的议论文既能击破前后七子的错误文学观，又能建立革新的正确理论，一扫王、李余霾；传记文则有《徐文长传》，对徐渭的才情、性格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此传一出，使几乎被埋没的徐渭(徐文长)名声大振，诗文得以广泛流行；抒情散文主要是与兄弟和朋友间的书信往来，尽情抒发感情，无矫揉造作，无虚言套语。袁宏道的这些交游活动和文学创作极大地提高了公安派的名声，是公安派鼎盛期的重要表现。

第三，袁宏道在吴中与张献翼的论战。这是袁宏道直接与复古派短兵相接的交锋。自1570年(隆庆四年)李攀龙逝世以后，“后七子”复古派活动的中

心就转移到吴中,因此,吴中复古模拟、蹈袭剽窃的积习很重。张献翼早年追随李攀龙、王世贞,颇染拟古风气,曾被王世贞列入“四十子”之一。袁宏道仕吴期间,张献翼也诗酒唱和,但仍以是否“似唐”为衡量诗歌好坏的标准。袁宏道曾作《张幼于》:“家贫困任侠,誉起为颠狂。盛事追求点,高标属李王。”此诗成为张献翼等复古派不满袁宏道的起因。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春袁宏道弃官后,张献翼因见袁宏道的《锦帆集》卷二中《王以明》《伯修》二札,认为袁宏道从骨子里看不起包括张献翼在内的吴人(指复古派),于是致书指责袁宏道及其诗歌。袁宏道写长信作了必要的解释,但对于张献翼所持的诗文观作了异常强烈的反击。从此,袁、张交恶,不再往来。袁宏道为《会心集》作序,提出了关于“趣”与“闻见知识”相对立的理论;至仪真后,作《江进之》阐述“赋体日变,赋心日工,古不可废,后不可劣”的观点,进一步阐发公安派的理论,继续与张献翼激辩。而江盈科随即即为《解脱集》作序,表明他支持袁宏道反对张献翼的态度。经过这次直接交锋,复古派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公安派开始全兴,以致原来属于复古派的成员也转投公安派,潘之恒即是一例。潘之恒早年曾师事王世贞,颇受复古派影响。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秋在武昌结识袁中道,又去麻城访问过李贽。因袁中道介绍其徒方文饌赴吴协理袁宏道的私人事务,潘之恒也开始与袁宏道书信联系。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春,袁宏道游歙时曾到潘之恒家里见面,相与论诗唱和,潘之恒受袁宏道影响而从复古阵营倒戈加入公安派,该年秋赴南京跟随袁宏道游历,直至第二年二月送袁宏道到扬州才告别。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潘之恒将其自1593年以来所作诗《涉江诗》二十卷请袁宏道删定。袁宏道从中精选出四卷,并于第二年正月十五作《涉江诗序》,对模拟剽窃、浮泛雷同的诗风大加挞伐。潘之恒此后一生几乎与公安派的兴衰相始终,是公安派取得胜利的标志之一。因此,袁宏道的东南之游和与张献翼的论战是公安派在复古派重镇吴中击败复古派、取得决定性胜利标志。公安派进入全盛期。

第四,北京崇国寺结社。袁宏道于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二月由扬州出发,进京候补,与袁宗道相聚。袁宏道入京后重申在吴地提出的文学主张,横扫京城尚存的复古、拟古、蹈袭余风。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至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公安派成员云集北京,不定期在不同场所聚会结社,论学赋诗,继续推进文学革新运动,在京官中产生了巨大影

响。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夏开始固定在崇国寺结蒲桃社(葡萄社),论学赋诗,抨击“后七子”。蒲桃社活动一直延续到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袁宗道逝世前。社友除三袁兄弟外,著名者尚有黄辉、潘士藻、江盈科、丘坦、谢肇淛、刘口升、吴用先、顾天竣、李腾芳、苏惟霖、王辂、方文饌、秦京、钟起凤、王衿、段徽之等。虽然该社并不等同于公安派,且聚谈的内容多为佛禅之学,但它的确以公安派成员为主,并有不少诗作保存至今。北京毕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这些活动表明公安派重心由吴地转移到北京,并且影响在不断扩大,仍旧处于全盛期。

袁宏道在京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期间,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另一方面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钱谦益后来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文风的转变,使诗文创作出现生机,“其功伟矣”。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四月,江盈科《雪涛阁集》十四卷付印,袁宏道为之作《雪涛阁集序》,再次申明反模拟剽袭主张。加上公安派其他成员的作品,可以说,至此公安派在北京已经取得完全胜利。因此,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至1600年(二十八年)是公安派鼎盛时期。《敝篋集》《锦帆集》《解脱集》和《雪涛阁集》等是公安派鼎盛时期标志性成果。袁宏道作用是巨大的,作为公安派主帅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袁宗道、袁中道及其他公安派成员的作用

在鼎盛期,袁宗道在北京继续开展反对复古派的活动,支持袁宏道,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副帅;袁中道也开始发挥作用,是干将;公安派其他成员对公安派达到鼎盛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袁宗道作《论文》上下篇,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主张文学随着时代而变化,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反对厚古薄今,反对模拟复古。他的理论得到一些文人的呼应、赞同或拥护,也起到给袁宏道、袁中道开路的作用。他的《论文》上下篇和于万历二十五年任东宫讲官的身份对于袁宏道和江盈科在吴地与复古派的交锋也是十分有力的声援。1596年冬丘长孺将《北游稿》也寄给袁宗道,袁宗道为之作《北游稿小序》,继续批判因袭模拟文风。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由

袁宗道和袁宏道、袁中道一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抨击“后七子”。袁宗道还写出《上方山四记》《西山五记》等以清润婉妙见称的散文，践行公安派的理论。

鼎盛期的袁中道以文学创作支持两个哥哥，成为公安派的干将。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袁中道的诗集刊行，袁中道于1596年请求袁宏道为之作序，袁宏道借此提出公安派的核心理论。因此可以说，袁中道为袁宏道提出公安派核心理论提供了机会。袁中道从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开始多次参与北京西郊崇国寺“蒲桃社”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哥哥。更主要的是，袁中道还以创作实践支持袁宏道，其作品如《游荷叶山居记》《过真州记》《游青溪记》《游灵岩记》等成为公安派的范文供他人学习。

在鼎盛期，江盈科、陶望龄等公安派成员也发挥了程度不等的作用，共同取得反对复古派斗争的胜利。江盈科在吴任苏州县令期间与袁宏道紧密配合，相互支持，是鼎盛期袁宏道最重要的盟友之一。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江盈科为袁宏道的《敝篋集》和《锦帆集》作序；1597年正月，袁宏道弃官前与江盈科商讨诗文革新的理论，袁宏道此后就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核心理论；1597年正月，袁宏道弃官后在东南一带游览一年多，以诗书相寄的方式和江盈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五月，袁宏道途经苏州时与江盈科见面会，江盈科索取袁宏道新作《解脱集》诗二卷付印，并为之作《解脱集序》。六月，袁宏道侨寓仪真后，又寄给江盈科游记、尺牘二卷，江盈科再作《解脱集序二》，与前二卷一起刊行。江盈科在这一阶段是袁宏道与复古派战斗的得力帮手和战友。袁宏道入京后，江盈科镇守苏州，实际上是作为公安派代表继续在吴中坚守。后来，在袁宏道的多次召唤下，江盈科终于在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正月进京，江盈科的大名也随着袁宏道及其著作由吴中向东南各地再至北京传播。因此，江盈科在鼎盛期辅助袁宏道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公安派成员中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替代、无法企及的。

陶望龄在袁宏道1597~1598年(万历二十五~二十六年)游历吴中期间陪同漫游；袁宏道与陶望龄商讨过诗文革新问题；另外，陶望龄在此期间创作了不少诗文，且风格大变，成为公安派兴盛期的积极追随者和参与者，对公安派的兴盛也做出了贡献。

三、衰落期(1601年—1626年)

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袁宗道去世的第二

年到1626年(天启六年)袁中道去世为公安派衰落期。这是一个逐渐衰落的漫长过程，共二十六年。1600年秋天袁宗道去世和京师攻禅事件是公安派衰落的开始，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袁宏道去世导致公安派更加衰落，1626年袁中道的去世则标志着公安派的彻底衰落。这一时期，袁宏道去世之前仍旧是公安派的主帅；袁宏道去世之后，袁中道接过公安派大旗，成为主帅。

(一)袁宏道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变化

袁宗道的去世和京师攻禅事件是公安派衰落的开始。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秋，袁宗道因病而亡，公安派损失一员大将。同时，因三袁兄弟感情深厚，袁宗道不幸病逝，袁宏道、袁中道遭受巨大打击。袁宏道更为悲痛，告假回到公安，长达六年。由此可见，袁宗道的去世对袁宏道打击更大。

对于公安派在京师结蒲桃社(葡萄社)和谈禅论学，东林党和浙党结成了联盟，发起攻禅运动。从禅风炽盛的1598(万历二十六年)前后至1601(万历二十九年)前后，京师攻禅势头日渐高涨，最终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1602年(万历三十年)二月，李贽被逮捕，三月十六日，李贽自刎，而京师攻禅气势并未停止。直到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明廷凌迟诸生以平息“妖书”纷争，攻禅事件才告一段落。在来势凶猛的攻禅势力的打击下，1600年十月，黄辉回归四川南充，1602(万历三十年)前后，袁宏道和袁中道回到公安，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陶望龄回到家乡著述讲学，其他公安派成员也纷纷离京，公安派社集活动减少以至于静寂。因此，京师攻禅事件成为公安派由盛到衰的转折点。经此一变，公安派不仅失去京师这块文学、学术中心，还在痛苦困惑、心有余悸中收敛狂傲之志。这种变化在公安派主帅袁宏道身上集中体现出来。

袁宏道因遭受痛失大哥袁宗道和京师攻禅事件的双重打击，锐气明显不如以前，“狂禅”有所收敛，稳实有所增加，对“狂禅”导师李贽的看法也有点变化：“先生(指袁宏道)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7](P758)}徐渭关注现实的思想开始对袁宏道发生影响，进而袁宏道文学思想也有所改变。此一时期袁宏道“性灵说”内涵与李贽“童心说”相通的内容已完全消失，创作方法和作品风格也从率性而作到讲求工炼，对传统经典作品也从“不可以优劣论”到部分奉为楷模，都表明他文学思想的转变。在《行素园存稿序》中提出“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的观点，把内容视为诗文创

作的第一要义,部分纠正了自己在前期创作中只重个人的情趣,而多少与客观社会现实绝缘的倾向。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之后,袁宏道忧虑国计民生的作品明显增多,如《答沈伯函》《竹枝词》《荆州后苦雪引》等揭露了万历矿税之祸,《显灵宫集诸公》《冯琢庵师》《答王继津大司马》《与黄平倩》《寿邹南泉先生六十序》等抒发了对国事日非而大贤不出的焦虑,《程母义行述》《郑母节行始末》《明司城陈君墓志铭》《题出世大孝册》等倡言合理道德。这些转变是袁宏道适应社会的结果,也是公安派开始衰落的体现。

袁宏道于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去世,公安派不仅损失领袖和衰落前期的主帅,导致三袁中仅剩袁中道一人;还因袁中道和袁宏道感情深厚,袁宏道的去世给袁中道以巨大打击,袁中道悲恸过度,差点死亡。袁宏道去世前后,公安派其他健将也纷纷去世:江盈科于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去世,陶望龄于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去世,黄辉于1612年(万历四十年)去世。袁宏道等公安派主要人物纷纷去世加剧了公安派的衰落。

(二)袁中道的极力维持

袁宏道去世前,袁中道逐渐成长,写出《李温陵传》和其他作品,极力协助二哥袁宏道,甘当副帅。袁宏道去世后,面对对公安派日渐增多的非议,袁中道站出来维护公安派,成为公安派衰落后期的主帅和中流砥柱。

第一,继续与公安派成员保持聚会结社交游活动,维持公安派大旗不倒。如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四月袁中道到南京,与江南名士钱谦益、韩求仲等聚会结社。

第二,袁中道对三袁的创作进行了一次系统整理。袁中道系统地整理、校对、出版了两个哥哥及自己的著作,使三袁的作品及其文风发扬光大,对维持公安派衰落期的影响具有很大作用,对后世了解和认识三袁和公安派作用更大。没有袁中道的整理、校对,后世可能难以全面、准确认识三袁和公安派。

第三,袁中道修正了公安派的某些文学主张。在对待艺术规范上由彻底否定“法”到适度肯定

“法”,在审美思想上由任性癫狂到讲求“淡适”,在心物关系与审美表现上更强调主体的“慧”。这些理论对指导公安派衰落期的活动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袁中道纠正公安派后学的某些偏差,为公安派的发展指路。尽管袁宏道已经去世,公安派已经衰落,但公安派尤其是袁宏道仍旧有巨大影响,学习者众多。但后学者缺乏三袁尤其是袁宏道的文学才情和天赋,一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过分强调自我表现,以致轻佻、浅薄庸俗、空疏不实,结果学袁宏道的人越学越歪,越来越受到批评,致使袁宏道和公安派声誉受到损害。针对这种情况,袁中道指出,袁宏道前期的文学创作为批驳复古派而以抒发性灵为主;袁宏道后期的创作已有些回归传统,已经注重向前人学习,要求公安派后学在学习袁宏道时认真领会,纠正创作“稍入俚易,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的偏差,适当向古人学习。^[8]经过袁中道的这些工作,适当修正了公安派此后的发展方向,保证公安派在他健在时仍旧保持影响,而不至于彻底衰落。

随着晚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导致东林学派崛起和阳明心学消歇,文学复古思潮再度复兴,晚明弘扬主体、张扬个性、正视人欲的性灵文学思潮渐渐衰微。1626年(天启六年),袁中道去世,公安派彻底衰落。

参考文献:

- [1]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 [2]钟林斌.公安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 [3]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4]黄仁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刍议[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
- [5]陈善华.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李贽与公安派渊源探析[J].殷都学刊,2007(2).
- [6]袁宗道.白苏斋类集·论文[M].钱伯城,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7]袁中道.珂雪斋集·吏部验封司袁宏道先生行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8]孟祥荣.袁中道: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兼论其生命态度和价值立场[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